

世界文学博览

BOER
ZUOPIN
JINGCAI



伯尔 作品精粹

● 倪诚恩，选编

● 河北教育出版社

SHIJIWENXUEBOLAN

世界文学博览

伯尔作品精粹

倪诚恩 选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世界文学博览》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巫宁坤

副主编 孙绳武 董乐山

委 员 (按姓氏笔划)

齐宗华 孙绳武 朱树飏 巫宁坤

高 莽 倪诚恩 陶 洁 黄宏煦

董乐山 韩世滋

世界文学博览
伯 尔 作 品 精 粹
倪诚恩 选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3.75 印张 350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15,000 定价:15.60 元

ISBN 7-5434-1482-1/I·64

出版说明

●世界文学博览●

《世界文学博览》丛书，系由世界近、现代文学名家作品专集组成。《伯尔作品精粹》为其中之一卷，选收了 20 世纪德国当代伟大作家海因里希·伯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18 篇（其中或为节选），并附简短评介。这些作品集于一卷，概括地反映了伯尔的主要思想、艺术特点和创作成果，使读者可以在获得艺术享受的同时，对作家及其大致创作活动得到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

《世界文学博览》丛书所收入的作家、作品，都经过慎重筛选，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评介文字简扼可信。本丛书的宗旨，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条了解世界近、现代文学主要风貌的捷径。

《世界文学博览》丛书，采用了大量已发表过的译作，在此仅向这些译作的译者和原出版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1A4E 56/3

《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各卷均由三部分内容组成：卷前的对作家的概述性评介；选收的该作家的作品；对作品的简短评介。其中以作品本身为“正”，占各卷绝大篇幅，余者为“偏”。评介文字置作品前，用楷体字，以与作品本文相区别。

由于本丛书所收入的众多作家经历、类型不尽相同，各卷在作品排序上也采用了较灵活的方法，如有的按时间顺序排，有的按品类分类排，等，未循同一格式。

因篇幅所限，对长篇作品，本丛书各卷一律采取“节选”的办法，择其中较有典型性的章节段落收入。这些节选部分在内容上大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因而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其标题或为原文所有，或为编者所加。长篇作品的评介部分中，一般都有介绍整个作品内容梗概的文字，此外还对节选部分的上下文作了交待。

凡已发表过的译作，本丛书各卷选收时，除为求得全卷一致而作了少量体例上的调整，以及修改了某些印刷错误外，一般都未对其原有文字擅加更动。原文中的脚注亦都保留。由于这些译作往往选自不同的书刊，脚注或有重复，特此申明。

本丛书各卷，力求收入作家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故名“某某作品精粹”。但因时间仓促，及我们鉴赏水平所限，选编过程中自会有所忽漏，抱玉遗珠，殊所难免，尚祈读者鉴谅。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序

世界文坛，名作如林，巨匠辈出，但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仍有许多鲜为人知。50年代中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为外国文学介绍事业开拓了前景，一时间，不少外国文学的经典著作和当代名篇都成了我国广大读者的精神食粮。可惜，早春天气乍暖还寒，从50年代后期起，外国文学介绍事业历经坎坷，许多文学名著被当成了毒草，文学巨匠被当成了罪人。甚至连伟大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丰碑《约翰·克里斯朵夫》和英国小说家艾米丽·勃朗特的巨著《呼啸山庄》都被指控犯下了毒害新中国青年思想的罪行。外国文学，特别是欧美文学，介绍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低潮。及至那场大革文化之命的史无前例的浩劫从天而降，几乎整个外国文学都成了“横扫”的对象，连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也未能幸免。近年来，“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我国文学介绍事业提供了新的生机，使之有了可喜的发展，翻译作品源源问世，各种类型的外国文学丛书也所在多有。那么，河北教育出版社为什么还要出这套《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呢？

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注意到当前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人，对近、现代外国文学名著表现出

浓厚的兴趣。但近、现代外国文学名家、名著不可胜数，一本本从头读起，既耗时费日，又缺少宏观体验。本丛书选择最有影响的外国作家，尤其是过去由于禁忌，或由于介绍方面的欠缺，而在中国鲜为人知，然在世界文坛颇有影响的作家，将其一生中的代表之作集于一卷，并邀请国内久负盛名的专家主持各卷的编选、翻译、评介工作，兼顾概述性和系统性，为广大读者了解近、现代外国文学的主要风貌提供一条捷径。

伟大作家和作品向来是人类进步历程的里程碑。以近、现代欧美文学为例，它既是近、现代西方文明和文化的产儿，又是其发展的一种动力。伏尔泰、卢梭、歌德、托尔斯泰、高尔基、萨特等等，等等无不既是文学巨擘，又是思想的巨人。他们那些不朽的作品对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作出了辉煌的贡献。《汤姆大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也许算不上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但是林肯总统会见这位瘦小的老太太时称颂她为美国黑奴解放战争的伟大旗手。惠特曼毕生穷困潦倒，但是他那前无古人的《草叶集》不仅为美国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而且为现代人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人学”。《悲惨世界》和《93年》的作者成为一代法兰西人的精神领袖，无怪乎雨果死后法国政府要为他举行国葬，巴黎的数百万市民要为他举哀送葬。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如果没有这么多伟大的作家和他们对真理与艺术执着的追求，西方社会也许也会逡巡不前，西方人的观念、意识、思想、情操也许也会滞留在前现代时期。因此，我们怀着十分虔诚的心情，把这套集近、现代外国文学之精英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呈献给广大读者，衷心希冀它对改革、开放这个新历史时期的人的现代化进程或多或少有所裨益。

巫宁坤

1988年秋于北京

海因里希·伯尔

——艺术与使命相结合的伟大作家

1985年一个晴朗的夏日，联邦德国著名作家科佩莱夫、马尔卡德、格拉斯、瓦尔拉夫以及死者的两个儿子抬着海因里希·伯尔的灵柩缓缓地走向墓地——联邦德国文坛的一颗巨星陨落了，他享年67岁。

伯尔是一位深受世界各国读者欢迎的作家，到他1985年7月16日逝世时为止，他的著作已被译成45种语言，总发行量达3100万册。联邦德国文学今天在世界文坛上赢得的尊敬与威望在不少程度上应归功于伯尔。由于“为复兴德国文学作出了贡献”，他荣获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

对于伯尔逝世，联邦德国朝野都表示哀痛。他的故乡科隆市下了半旗，联邦德国的各大广播台、电视台立即播送悼念这位伟大作家的特别节目。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致电伯尔夫人说：“随着海因里希·伯尔的去世，我们失掉了一位德国文坛巨擘。无论思想自由在哪儿受到威胁，他

总是奋起维护它。他好争吵令人不快，他既叫人反感，又赢得别人尊敬。我们将因为再也听不见他那充满无畏精神、社会责任感和警觉性的时时告诫着我们的声音而惆怅。他的作品永垂不朽。”中国作家协会的唁电说，伯尔是“中国作家和读者的好朋友，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

海因里希·伯尔 1917 年 12 月 21 日生于科隆的一个天主教徒家庭里，父亲是个木匠。伯尔中学毕业后曾当过书店学徒。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被征入伍，战后当过木匠和统计员。

伯尔的文学活动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 1947 年到 1952 年，他陆续发表了中篇小说《列车正点到达》（1949 年）和长篇小说《亚当，你曾在哪里？》（1951 年），但这一时期他的短篇小说和小小说（Kurzgeschichte）最为成功，例如《飞刀艺人》（1948 年）、《浪游者，你若来到斯巴……》（1950 年）、《败家子》（1951 年）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些作品主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题材，深刻地揭露了法西斯战争的罪恶、荒唐，反映了德国人民在德国法西斯发动的侵略他国的战争中蒙受的灾难。在这些作品里几乎没有正面描写战争的场面，法西斯刽子手及其工具也都停留在幕后，伯尔着意刻划的是普通德国士兵和德国市民——一群小人物，战争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他们受尽苦难——心灵的、肉体的、物质的苦难，他们对战争有切身的体会但并不理解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战争犹如一种可怕的自然灾害，其肆暴的力量与后果是人们熟知的，但产生这种自然灾害的原因却神秘不可知。因此，他们对于法西斯战争没有什么反抗，但他们不愿随波逐流，为法西斯利用，他们不是英雄，只是正直的普通人，束手听凭命运宰割的普通人。总而言之，这些眼界狭隘的人们，在道德上是无可指责的。伯尔这一时期的小说，语言幽默自然，不加雕琢，作品结构明白易懂，这在德国文学中是少见的。伯尔在艺术上最了不起之点是，他善于选择场合、情景、情节，形象地

表达他对世界和事件的看法，读者可以从一个人、一件事看到整个社会和时代。

1953年到1963年间，伯尔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中、长篇小说的创作之中，其中著名的有《一声不吭》（1953年）、《无主之家》（1954年）、《昔日的面包》（1955年）、《九点半钟打台球》（1959年）、《小丑之见》（1963年）等。在这些小说里，主题已从批判战争转为批判战后的西德社会。战后的西德是同法西斯时代的德国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但战后的西德社会依然是冷酷无情的，善良的人们受压抑、受侮辱、受人践踏，他们依然只能束手听凭命运宰割。于是小商小贩、小职员、孤儿寡妇等等小人物在西德“经济奇迹”中的遭遇构成了伯尔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小说的叙述方式基本上还是传统式的，但已经引进了许多现代派手法，例如视角变化、内心独白、破坏以时间为序的情节单线发展、“当时”与“过去”交叉形成多层次等等。因此，伯尔的作品既通俗易懂又有新意，拥有各层次的广大读者。

60年代下半时，伯尔的文学活动比较沉寂，但是到了70年代他连续发表了《莱尼和他们》（1971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1974年）和《保护网下》（1979年）三部杰作，他的文学成就又达到了新的高峰。《莱尼和他们》和《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都是采用纪实小说形式写成的虚构小说，后一部则是真正的虚构小说，但又有文献纪实小说的特点。伯尔的这些作品把虚构的人物、情节、主题和60年代流行的文献纪实小说的各种要素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虚虚实实既夸张又真实的审美效果。伯尔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艺术创新。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莱茵女流录》，它是在伯尔逝世之后不久于1985年8月19日出版的。伯尔在这部小说里又打破了小说和戏剧的界限把两种文学形式融为一体。如果把伯尔的晚年作品和他的早期著作作一番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伯尔观察现实的目光愈来愈尖锐，

对于现实的批评也愈来愈严厉，因此他的作品往往受到某些评论家的猛烈抨击。他们的批评从表现上看是美学、语言和艺术领域里的争论，但实际上正如阿希姆·凯泽在评论《保护网下》时所说的“……不是由于伯尔已经把他玄奥的咒语——德语——完全荒疏，忘得精光。其原因恰恰在于伯尔的这部小说击中了要害……”^①正因为如此，具体派诗歌的主要代表、著名诗人海森比特尔针对那些批评家旗帜鲜明地说：“我要在这里毫不含糊地指出，伯尔的美学能力同他对于联邦德国现实认识的敏锐性是同步增长的。”^②

分析研究自己所处时代和国家中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瓦解——这正是贯穿着伯尔卷幅浩瀚作品始终的一条红线。对于这一点伯尔自己有过明确的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瓦解是文学的老主题。它在二三十年代已经一目了然，所以我可以没有意识形态上多方面准备就把它作为主题，作为材料。”^③正因为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准备”，所以伯尔不是“倾向小说家”，他的创作目的不在于揭示问题和指出应该达到的目的；不在于解决战争、社会等等矛盾的解决办法；不在于动摇婚姻、儿童教育等稳定的价值观。^④伯尔只是一个道德家，主要从道德的角度来评价社会现实。他的道德观是建立在基督教唯心主义思想基础上的。

伯尔是天主教徒，笃信基督教义才是救世之道。他尤其信奉耶稣的山上宝训^⑤，认为其中提出的戒律就是真正基督的行动准则，而世界的希望就在于实现这些准则，做到爱上帝，爱人类。他认为，基督所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

① 载 1979 年 8 月 25—26 日《南德意志报》。

② 载《海盜》杂志第 25 期，1985 年。

③ 《三月里的三天》，伯尔全集《谈话卷》第 377 页。

④ 参见：《一个德国人的回忆》，伯尔全集《谈话卷》第 569 页。

⑤ 参见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第 5、6、7 章。

经战胜了世界”这句话并没有变为现实，所以基督教还在刚刚开始实现教义。他认为，上帝救赎人类就是使人类获得解放，解除犹太人的痛苦、黑人的痛苦、儿童的痛苦。伯尔说：“现在世人所惧怕的不是死亡而是生活，他们惧怕权力和环境，惧怕饥饿和刑罚，惧怕战争……”^①因而现在的世界是个“没有基督的世界”。他还认为，应该救赎人类于今世，不是救赎人类于来世，否则宗教的虔诚就没有多少价值。伯尔认为，实现这一切的关键是人要摆脱权势与财富的诱惑，正如耶稣所说：“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②

在这种基督教唯心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伯尔反对权力，反对一切形式的强制。他认为国家、教会、婚姻等等无一不是一种强制形式。所以，伯尔是一个遵守法纪的西德公民，但他对西德国家持批判态度；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在1979年11月和妻子一起退出了天主教教会。在这种反权力反强制的意义上，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综观伯尔的作品，他对于战争的揭露，他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都是他的基督教道德观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和变化。伯尔在谈论他自己的作品《一声不吭》时——一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德社会生活的小说——说道：“我确信，即使没有战争，没有纳粹，我几乎也会如此写这本小说……除了一些和当时时代有关的细节，这部小说不会有别的写法。”^③在谈到描写战争的小说《亚当，你曾在哪里》时，伯尔说：“（如果没有战争）书里的人物当然不会是军官、集中营司令官、军士、少校或上校，可是这儿描写的军队里的强制却依然是书中的主题，您可以想象，它会变成是一个大企业里的、家庭里的、大家庭里

① 参见《你如何评价基督教》，第22页。

② 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第13章22节。

③ 《一个德国人的回忆》，伯尔全集《谈话卷》第515页。

的强制。”^①

可以说，牢牢掌握住伯尔的基督教道德观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就是掌握了通往伯尔作品思想内核之门的钥匙。伯尔有许多小说描写的是孤僻的人、离群索居的人，他们同周围的人不和，他们所能退居的唯一庇护所就是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要逃跑，但无法超越界限找到新生活。这些故事看来平淡无奇，其实含意很深。它们的主人公就其主观愿望而言是要解放自己，自觉地置身于一切社会通行的准则之外，蔑视社会道德观念所认可的原则，反对只求效益只求实利，不随波逐流我行我素。而这种反对只求效益的思想正是伯尔反对各种强制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重要一面，是伯尔作品的中心概念之一，是对于他生活其中的社会的批评。伯尔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只求效益的准则破坏了每个人的生活。他说：“我认为，我们可能会毁于追求效益之中。处处只求效益不仅影响工人和管理人员，它也影响作家，作家也在这种机制中运转，因为每个单位都以提高销售额作为义务。这只能置人于死地。”^②他还认为，人只要登上这座越转越快的追求效益的旋转木马，就得不断使劲卖命，而且永远无法脱身，这是一切痛苦之源。

伯尔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机会均等追求效益是欺人之谈，他说：“一面追求利润，排挤他人，追名逐利，明争暗斗；一面又说机会均等，这是弥天大谎。所谓士兵背囊中的元帅权杖就是一例。人人都知道，十万士兵之中只有一个人可能当上元帅，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人是当不上的；从统计数字来说士兵当元帅是毫无希望的。可是这种模式比比皆是。在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模式，那里塑造了元帅形象，我非常厌恶。在行政管理部門、在军队里同样存在这种模式，据我所知，那里是一万人中产

① 转引自巴尔策尔：《〈保护网下〉评论材料》第49页。

② 《时代周刊》第32期，1971年8月6日，第9—10页。

生了一个将军。可是又大谈机会均等，我觉得这令人难以忍受。我认为，这正是年青人的问题所在：他们在一个只讲效益也就是只讲利润的社会里看不到出路。”^①

与此相联系，伯尔的作品批判了顺从时势随大流的倾向。这是因为自 50 年代初西德进入经济繁荣时期，许多人把物质富裕和社会进步混为一谈，市民们忘记了法西斯专政时期的灾难，一心追求物质利益，不再能够透过表面上富裕繁荣的现实看到潜伏的危险，不知道随大流顺从时势会导致历史悲剧的重演。伯尔以道德规范为警钟使生存在胁迫之中而麻木不仁的读者惊醒，告诉他们什么行为合乎道德，什么行为是不道德的。

由此可见，伯尔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理想，他的道德观念和无政府主义的反强制思想也不是什么政治纲领，他没有什么救世良方，他只是批评了当前的社会。

伯尔之所以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因为他在青少年时期经历了 20 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就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时代里，许多人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形式，同时又对各种政治过程高度敏感。伯尔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固有的对于各种资产阶级形式的蔑视，包括穿着在内。因此我现在极力反对人们把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主义分子相提并论……那个时候不再有什么可以对人有所安慰的，人们只是一天又一天混日子，所以无政府主义的或近乎无政府主义的特点盛行。总是处在动荡变迁之中，规律和秩序——即使是小资产阶级的规律和秩序——都已荡然无存。”^②

在那个岁月里，伯尔的父母没有一个月不在为付房租而操心，总是担惊受怕：“这下子我们得扫地出门了。”^③ 正由于这个原因，

① 《同阿尔诺德的谈话》，伯尔全集《谈话卷》第 135 页。

② 《三月里的三天》，伯尔全集《谈话卷》第 380 页。

③ 同上。

伯尔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价值体系：肯定和重视简单的事物。在他的作品里诸如衣食住行和男女之爱等等人类最原始的需要和最基本的价值总是占着突出的地位。伯尔在一次谈话中说：“饮食是最基本的事情——付得起房租，买得起鞋都是首要大事。这是一个人的经历问题，这种经历至今未忘，虽然我现在随时可以买一双鞋……很奇怪，这种经历至今不能忘怀。我们每次吃上一顿早饭，我总感到喜悦。”

这样的价值观在西德战后社会中逐渐为人们遗忘，缺吃少穿基本需要得不到保障等等成了遥远的历史。可是，伯尔的巨大成就也许正是因为他描写了这种最基本的需要。伯尔的作品不能使一味追求“美学”效果的人得到复杂的心理享受，伯尔致力于描写普通人的衣食住行以及他们如何被剥夺这种基本需要。普普通通的人们在伯尔的作品中看到自己的日常生活、自己的难题得到维妙维肖精细入微的描绘不禁拍案叫绝，这种美学成就是不能低估的。

伯尔的美学成就还表现在他对现实主义发展所作的贡献。评论家普遍认为伯尔是个现实主义者，然而伯尔已经不是巴尔扎克式的“历史的书记官”，他无意按照生活的表面模样加以摹写。他认为现实有“所谓现实”和“真正的现实”两种。“所谓现实”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现实，包括人们耳闻目睹的事实、历史事件、个人经历等等。“真正的现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今天的“真正的现实”要到明天或后天才能显露出来。真正的现实不是唾手可得的，“它要求我们积极地、不是消极地去注意它。我们所能得到的是密码——开启现实之门的万能钥匙是不存在的：书籍、事实等等最多是现实的一部分，或者是通往现实的一把钥匙，它像打开大楼的门一样打开现实，让人们进去看一看……真正的现实总比当前发生的事件离我们更远一些。”^①

① 《同时代人和现实》，伯尔全集《散文卷I》第73页。

文学是如何反映现实的呢？伯尔认为要通过想象，我们只有把批判性的想象力发挥起来，才能认识现实。他说：“没有想象根本不可能认识现实。”^①“我们的想象也是真实的，它是我们天生的现实才能，使我们能够从事实中认出现实。”^②这就是说，文学能够运用想象力透过事实的表面洞悉事物的本质，找到真正的现实。

基于这样的认识，伯尔认为，作家的任务不在摹写眼前发生的事件，现实主义作家在观察世界和社会时应当有远见，他应当尽力表现今天的社会将走向何方，它在明天和后天的状况。现实主义作家就像是猎射飞鸟的枪手，只有瞄准飞鸟的前方才能击中它。^③西德的读者常常以此作为标准衡量伯尔的作品，看看他如何预见联邦德国社会的发展。因此，带着这样的问题去阅读伯尔的作品，即使是早期的作品，也使读者感到兴趣盎然。我们可以看到，伯尔总是以当前发生的事实作为素材发挥想象力，达到表现作家观点、感情、情绪的目的。他常常使事实变形扭曲，利用夸张想象的手法把主题更加鲜明地表达出来。伯尔作品反映的“事实”只是历史事实的幻影，犹如中国画中的写意画，既似现实又不似现实。中国画有“大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之说，似乎可以用来说明伯尔作品的特点。

伯尔的现实主义又是把当时当地的现实和“神话——神学”难题相结合的，因而获得了“永远常在”的生命力。伯尔的作品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永葆青春，其秘密就在于此。伯尔说：“世界历史随随便便送给人们的零碎儿，例如战争、和平、纳粹、共产党人、市民等等这一切都是第二位的。真正重要的是连续不断的東西，我几乎要说，神话——神学难题才是永远常在的。”^④

① 《三月里的三天》，伯尔全集《谈话卷》第417页。

② 《同时代人和现实》，伯尔全集《论文卷I》第72页。

③ 同上。

④ 《一个德国人的回忆》，伯尔全集《谈话卷》第516页。

伯尔的众多作品虽然反映的历史现实极不相同，但是它们的主题都是围绕几个神话——神学难题的。他的著名小说《卡塔琳娜·勃罗姆》当然有政治现实性；然而它的主题（大众媒介传播工具污蔑人们）却是一个古老的主题——一个人的尊严受到流言蜚语的损害而无法自卫。正因为这么一个流言蜚语问题具有神话性质，所以在它发表之后多年，在远离伯尔生活其中的西德科隆市的中国新疆，卡塔琳娜·勃罗姆化身为蒋爱珍重演暴力由此产生的悲剧，使中国读者对于伯尔作品的典型性感到惊讶。^①

伯尔的现实主义还具有和现代派手法相结合的特点。伯尔的创作注重内容并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不单纯追求形式，不单纯追求主观意识的表现。然而，他的作品又大量采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多视角叙述等这些现代派的典型手法。伯尔对于内心独白的处理十分细腻。《保护网下》一开头就描写了托尔姆接见记者时的双轨思维方式：在一条思维轨道上，他侃侃而谈回答记者的问题；在另一条思维轨道上他研究自己从恐惧转为好奇的过程。这种立体的内心独白在文学创作史中是比较少见的。同时伯尔又用自由联想来加深和扩大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将现在、过去和将来，将此处和彼地交织在一起，时间的跨度和空间的幅度都因此得到扩展。

伯尔在中国的成就远远超过他的本国同行们。中国读者普遍认为，联邦德国的当代文学沉闷难懂难以卒读，但伯尔不在此例。他的写作把传统方法和现代派方法融合贯通起来，因此既符合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又使中国读者感到新颖。伯尔是联邦德国文学中最早被译成中文的作家。早在1956年10月，《世界文学》的

① 蒋爱珍是中国新疆戈壁沙滩边缘一座军垦农场医院里的女护士。她在1978年9月29日凌晨开枪打死了三个男子，因他们诬陷她，损害了她的名誉。蒋爱珍是年21岁，后被依法判刑。